

# 评论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关莫言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生教材的话题引起热议。语文出版社称,目前该社已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认为,不要低估中学生的理解能力,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诗意,非常适合中学生读。(10月14日《京华时报》)

## “从诺奖到教材” 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吴江

平心而论,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当然不言而喻,即便是在诺贝尔文学奖所最常眷顾的西方国家,获奖作家也往往会因此而获得包括商业在内的极大关注。既然如此,早就对诺贝尔奖充满渴望的中国,对于首个中国籍作家获奖而引发的热闹场景甚至是单点聚焦,自然也就更不必觉得意外。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遭遇挖地三尺、翻箱倒柜,不能不说是当下这个时代“赢者通吃”现象的又一极端体现,在诺奖获得者这样的殊荣面前,连语文教材也难以淡定,急于与时俱进,与诺奖看齐,收录诺奖作者的文字,其心情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诺奖评选的眼光虽然也不乏争议,但却仍大体不失公允,更能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同与关注,那么,获得诺奖当然不能说全靠运气,而的确有其获奖的道理和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诺奖看走眼的几率并不高,那么,将诺奖作家的作品入选教材,多半也错不了。至于对于诺奖获得者的文字是否适合中学生去读的担忧,其实也大可不必过虑。毕竟,除

了《丰乳肥臀》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也有“充满诗意,非常绚丽的作品,能让十几岁的年轻人体会到中国文字之美”。这些作品被选入教材,要说也无可非议。

当然,诺奖归诺奖,教材归教材,尽管都是对作品与文字的遴选,但标尺显然并不一致,当然也就不必去盲目跟风。例如,国外的诺奖获得者,尽管获得商业出版的追逐是常有的事,但成为教材眷顾的对象,似乎并不多见。那么,国内教材选入莫言作品,究竟是与诺奖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外巧合,还是仅仅因为诺奖的影响力,而被动选择,教材选入莫言作品,似乎也有必要如同诺奖一样公布其入选的理由,以及教材选择作品的眼光。

一言以蔽之,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诺奖固然是作家的无上荣誉,更是对其作品的充分肯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材也必须去亦步亦趋,否则的话,即便是与诺奖站了队,恐怕也无关教材编选的水平,甚至反而暴露其眼光的势利与局限。

# 微评论

## 荒芜的监督 衍生“疯狂的支架”

东湖客

“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此,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建议做支架。”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表示。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表示,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今日本报18版)

整个链条缺乏监管,也没有有力的惩戒手段,支架等医疗器械、耗材的流通过程,十分混乱也就在情理之中。

这个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以药养医”机制。当时,由于财政投入有限,医疗资源不足,国家有了药品加成政策,但是如今这一政策早已异化。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药品加成政策已逐步演变成以药养医这种逐利机制。这种逐利机制,使公立医院偏离了公益性的方向。老百姓看不起病,同时老百姓也用了很多不该用的药和器械。

18世纪的医学专家在没有支架的时代,能把病人带到空气新鲜的森林里用伐木的方式治好了心绞痛。虽然今天我们不奢望医生能放弃搭桥的现代技术而带领病人去伐木治疗,但是给病人合理而不过度的治疗,应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做到的。

但是,要做到这些,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医德的回归,仍须有制度的护航,即医改之船的正确航向和“以药养医”机制的消除,还有,外部的监督也不可或缺。

## “喇叭执法” 犹如隔靴搔痒

舒锐

10月12日,广州交警联合多部门整治濠泉路的交通秩序,透露将对占道经营阻碍交通的商家,用高音喇叭进行劝导。(10月14日《京华时报》)

根据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商业区噪音标准白天为60分贝,夜里为50分贝。显然,高音喇叭产生的噪音,将超过这个标准,对周围群众产生噪音污染,使无辜群众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执法成本。这些群众不仅包括周边住户,还包括商家客户及路人,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另外,“喇叭执法”对于违法商户更是一种额外的惩罚,它并没有行政处罚之名,却有着行政处罚之实。

# 时事乱炖

昨日,一条题为“沈阳街头一建筑酷似黄金版‘大裤衩’”的微博引起网友热议。从微博配发的图片看,这是一座位于铁西区核心位置,上部为黄色、下部为棕色的建筑。开发商回应称,建筑原型其实是个“鼎”。(10月14日新华网)

## 造房子不是搞怪比赛

钱凤伟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说,怪异建筑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确实,比如对于“裤衩”,大多数的中国民众至今还是对其难以“消化”。

显然,建筑并非建筑师的实验场,建筑的功能也不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更不是以搞怪吸引眼球。即使是引人注目的外形,与主流的、大众的审美观、价值观相符,也应是城市建筑的应有之义,如果城市街头充斥各种各样的怪异建筑,公众一旦走上街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

无论如何,城市建筑不是私家客厅里的陈设,而既然每分钟都要进入市民视野,公众当然有话语权,尤其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更不能由投资方说了算。否则,如此造房子的搞怪比赛,只能愈演愈烈。



王恒/图

# 时评

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2011-2012年度国人依旧忙碌,人们的休闲时间连续三年下滑。休闲时间指数的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10月14日《扬子晚报》)

## “休闲时间越来越少” 源于“自由时间”的本意丧失

钱兆成

什么是休闲时间?社会学家魏克曼把休闲时间看作“大体上等同于自由时间。是在承担了工作责任,满足了像睡、吃、个人卫生这类最重要的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之后所剩余的时间”。然而,相对于人的无限多样的需求与欲望而言,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在经济的不断增长中,“欲望制造”和“加速消费”导致人们对时间需求不断增加,使得时间发生一种普遍性的稀缺。而时间稀缺性变化也引致出休闲的变化,“自由时间”的本来意义失去了,表现为休闲的工作化与休闲的物质化。这也就无怪乎休闲时间指数连续三年下降,只因很多时候休闲被物质劫持。

忙碌的城市中,你有多少休闲时间?你过得幸福吗?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后,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内心感受。如果说,闲暇是幸福的基础,那么收入水平则可影响这种幸福感的层次。但国民休闲活动比较单一,大部分人都热衷于上网和看电

视,而且多数会选择娱乐类节目,选择出门看电影、戏剧,参加培训的人并不多。这种休闲方式多少有些被动,甚至有些苍凉感。

习惯于被动休闲有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们崇尚静态休闲,很多人对体育锻炼潜意识里就不积极,但这也是很多人无奈之下的选择。更多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休闲,而是没有资本休闲。这种情况下,需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

事实上,“为生活而工作,还是为工作而生活”,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于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思考。长期以来,人们都把物质文明作为衡量人类进步的尺度,但进步的手段不能等于进步的最终目的。休闲面对的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正是这一新的休闲理念的确立,使我们有信心相信一个大众休闲的时代正在来临。只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我们就不仅能理性地认识休闲,而且也能有意义地享受休闲。

# 非常道

“想要加班费可以,拿钱后直接走人。”“失业比没得几天的3倍工资更惨。”

一项有9224位网友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加班没领到加班费的人有6732人,占7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多人不得不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却在白干的现实。这样的担忧则从一个侧面表明劳动者不敢维护正当权益的现实。

“这就是所谓的金饭碗?简直是史上最苦金饭碗啊!”

2013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计划招录公务员2万余人,具体职位表日前正式公布,但职位表上的一些“备注”,诸如“经常出差”、“下基层”、“加班”等,让不少考生“凉”了心,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有网友感慨。